

蔣介石 一位彈性國際主義者： 以1942年訪印為例的討論

呂芳上*

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促成的同盟國陣線成形後，中國終於有機會躋身世界「四強」之列。蔣介石作為一個東方大國的國家領袖，一方面為中國因此能擺脫百年來「不平等條約體系」下國家地位的提升，感到光榮和驕傲；另一方面又深以「中古中國」的現狀，竟能與近代化強國並列，覺得心虛。這在蔣介石日記，記錄一個貧弱大國實際狀況與國際強國並列時，感受強弱落差的內心煎熬中，有充分顯現。

1942年2月，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偕同隨員15人正式出訪印度。訪印之行，結果雖不算成功，但訪問過程顯示他手腕靈活又善於利用機會，進行外交活動。他把此行界定為「濟弱扶傾」之旅，時時惦記的是解放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被壓迫民族，正凸顯了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的一面。有意思的是他樂於接受帝國主義者(英、美)的安排，使中國晉身四強之階，卻常批判帝國主義的是與非，又時時提醒自己不要稱霸。

* 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
聯絡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10048 Changsha Street on the 2n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Taiwan (R.O.C.))。

如果從1920年代蔣介石涉入並主導中國政治後的長期經驗加以觀察，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又是一位彈性國際主義者。

關鍵詞：蔣介石、印度、甘地、彈性國際主義者

一、前言

19 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所遭逢的近代帝國主義與傳統帝國主義已有不同。結合新的交通、訊息、技術，加上工業化、城市化、和資本主義的擴張，不單重組歐洲的民族國家，也重構了亞洲被殖民或瓜分的地域生態。及至 20 世紀中期，一種新的國家機器，利用有形的戰爭或無形的手段，不獨利用政治、軍事的手法，更以資本主義為本質的高度發展，形成一種文化的論述。種族優越、文明發展論及文明傳播論下強國霸權的控制，遂由之產生。¹這種強權的登場，當然影響國際關係的格局。一次戰後，在凡爾賽、華盛頓會議的世界外交體系下，包括中國在內的被壓迫民族，滿懷正義與公平的期待，一旦落空，國族主義乃蓬勃發展。在民族自決與國家主權獨立的呼聲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堅持國際化以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便成為國民積極的要求和國家領導人必得重視的方向。²

1937 年，日本侵華，在東方首先挑戰華會國際關係體系；1939 年，德國襲擊波蘭，成為凡爾賽國際格局的破壞者。二次大戰爆發，隨著國際體系的重組，美國利用戰時國際格局轉型的契機，躍升為世界霸主，而老牌帝國的英國猶能扮演落日餘暉的角色，蘇聯則從瀕臨危亡中復甦。與此相較，中國是強中之弱者，因能進行持久戰爭而獲重視。顯然，未來的國際局勢，便由這「四強」進行妥協安排。

1941 年底，珍珠港事變促成的同盟國陣線成形後，中國終於有機會躋身世界「四強」之列。蔣介石作為一個東方大國的國家領袖，一方面為擺脫百年來「不平等條約體系」下國家地位的提升，感到光榮和驕傲；另一方面又深以「中古中國」的現狀，竟能與近代化強國並列，覺得心虛。《蔣

¹ 相關的分析，參見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troduction." 中文譯本見何偉亞 (James L. Hevia) 著，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課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12-22。

² Guoqi Zu,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2005), 244-263. 中文譯本見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258-276。

介石日記》描述了一個貧弱大國的實際狀況與國際強國並列中的落差，顯示了內心極大的煎熬。

儘管如此，蔣頗知利用二次大戰中，中國作為亞洲「大國」領導者的條件，不僅為中國自身且為東亞，不斷對列強進行外交出擊、折衝與交涉。於此，英美或視之為麻煩製造者，但蔣則在帝國與殖民時代落幕之際，讓中國走入世界，積極為中國締造在新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從某個角度來看，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又是一位善於自我定位的彈性國際主義者。

本文以近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為基礎，重新展開蔣在戰時外交經驗的討論。

二、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實與虛

蔣介石的政治事業發跡於黃埔建校，「校長」與「黨軍」的革命過程，縱有孫中山的支持，面對陌生環境，在無人才、無經費、立足於無組織的社會中，仍得引領革命勢力向前行。「黃埔經驗」大約用「蕞路藍縷」、「親愛精誠」八字可資形容。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蔣自謂：「權利可以冀土，責任豈可以放棄乎？生命可以犧牲，主義豈可以敝屣乎？此時再不決心，尚待何時！若不殉黨，何顏立世。今日事只有直前奮鬥，期毋忝所生，不負初衷！」³顯示一個游俠浪人、革命志士走向地方悍將的心路歷程，內中心理充塞神秘因素外加感情作用。此後幾年，蔣從一個不離傳統的現實主義革命家，經過政治上的磨鍊，逐漸懂得收斂個性、⁴知所行藏、⁵確立自信心，⁶再由地方政權的將領，儼然轉變成國家的領導人。

³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547。

⁴ 蔣在早期參與孫中山護法戎機乃至黃埔建校時期，為人詬病的莫過於使氣任性，有多次「出走」的記錄。1927年4月20日，蔣於改組黃埔同學會演講中說，孫中山在世時，他隨時可能會因負氣一走了之，孫過世後，「我哪裡還可以像從前那樣不負責任的輕易跑開呢？」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1927年1月至8月（臺北：國史館，2003）第1冊，頁317。

⁵ 蔣的政治生涯中有三次下野，1927、1931、1949年。三次下野與復職的經過和意義，還待進一步的疏解。

⁶ 1928年9月北伐統一將告成，蔣介石自記：「道德為事業之基礎，余為一代領袖，言行舉動皆以一世之風化所關、人心所系，立品敦行不可一時忽也。必煩言不妄發、

蔣介石的政治歷練還可以從他對涉外事務、現代知識的擴展中體會。從抗日戰爭前蔣介石的言行觀察，他原是民族主義者，後來屬於民族的國際主義者(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ism)。⁷他對帝國主義「愛恨交加」，所以又可以說他是「彈性的國際主義者」。從晚清到民初，蔣介石是孫中山的信徒，是五四人物，是民族主義者。1925年6月23日，廣州發生沙基慘案，英兵射殺聲援五卅慘案的遊行，使民眾死60人，黨軍學生死亡23人，傷者無數。蔣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直斥「英賊帝國主義」為「陰番」，日記中之指斥者再，歷一年有餘。⁸1928年5月，日軍阻撓北伐造成了五三慘案，蔣復自記「濟南之辱，非言可喻」；⁹5月10日，「每日六時起床，紀念國恥」；5月14日，「每日必記滅倭方法一條」，自是日記中增闢「雪恥」一欄，從此每稱日本為「倭」。這種國恥感，成為他未來建構新國家與國族的基本動力。事實上，蔣介石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情很感興趣，1920年初曾學俄文，擬赴俄國一窺反對資本主義之革命的實況。若赴俄不成，他也想學英文，遊歷世界，「研究世界潮流，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真相。」¹⁰1923年，去了一趟俄國，對紅軍組織印象深刻。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蔣在國共、左右權力鬥爭夾縫中掙脫，從此對蘇俄沒有好感。¹¹20年代在清黨反共之前，蔣介石的確呼應時潮大力呼喊「反對帝國主義」。及至1927年3月，北伐過程中，南京事件發生，涉及多國的外交，蔣固仍指斥「赤白帝國主義的

行不安動，而後乃可為一世師也。」《蔣介石日記》，1928年9月13日。胡佛研究所藏，影印原件。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蔣汪開始合作，蔣已流露獨當一面的自信，「中國有我在，必有辦法」（《事略稿本》，1932年6月，第15冊，頁205）；「（國家）此等難事，若非我擔負，其誰能擔負之？上天之所以託付於余者，豈輕易之事乎？」（《事略稿本》，第16冊，頁176-177）。

⁷ 借用Wilhelm Reich的討論，轉見徐國琦，《中國與大戰》，頁58。

⁸ 《蔣介石日記》，1925年6月23日。「陰番」是蔣自創的用詞，諧音加文化心態上的鄙視，極值玩味。6月25日起，《日記》每日斥責英國「陰番」，並書以警語（如「如何可以滅此陰番？」、「陰番不滅非男兒！」、「陰番可殺！」等），直至次年7月北伐軍事倥傯始止。

⁹ 《蔣介石日記》，1928年5月3日。

¹⁰ 《蔣介石日記》，〈雜錄〉，1920年。

¹¹ 到1942年1月30日，蔣日記甚至於說：「世界上之國民最無人生意義與樂趣者，其惟俄國乎？以生命與自由悉操之於共黨，假工人階級之手，毫無情理法之可言也。」

夾攻」，惟另一方面認定中國已非昔日的中國，同時又出諸理性呼籲列強應體認：國民革命係以追求國際地位平等原則下，以外交手段解決難題。¹²1928年4月，他重新定義「革命外交」為「以平等為原則，相互尊重之精神，實現舊約之廢除，新約之締結是也。」¹³大有別於武漢時期激進外交給人的印象。這一時期修約、關稅自主的交涉案多起，蔣對「反帝」亦有新的思考：「打倒帝國主義，不像打倒軍閥只要破壞，而且要建設的努力。拿出實在力量給他們看，他們才肯屈服。這極需周密的準備，有相當的知識和學問才行。……我們要展現建設能力，要科學發達、物質文明進步，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¹⁴和這個想法可以互補發明的是，1931年11月，蔣在闡釋國家生計建設時，指出現代世界之經濟關係，已由「國民經濟時代」進入「世界經濟時代」，落後的中國必須充分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¹⁵他一面利用帝國主義侵華的負面形象，激起民族主義的熱情，一方面又挪用帝國主義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長處，推動新國家的建構。帝國主義帶給發展中國家之反抗與適應的雙面性，在中國領導者身上展露無遺。¹⁶

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國在一夕之間喪失東北，打擊沈重。當時國民政府無力對抗，只能訴諸國際。甫經復出的蔣介石，指出時勢與昔不同，國家不能遺世孤立，國際有相安相助之道，世界有公理，尤不容一國飛揚跋扈。日本自絕於世界，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國聯自應有所處置。¹⁷蔣這些話，中國這個立場，再一次為歐戰後威爾遜(Woodrow Wilson)民族自決、民族平等原則作聲援，也呼應孫中山對民族主義的新詮釋。這次事變，蔣與日本再次交涉，與國聯開始交手，擴大他的國際視野和國際觀。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以蔣介石、汪精衛合作為主軸的國民政府爭取英美支持，嘗試以國際公約為憑據，要求廢置不平等條約，並對日實施制裁。蔣介石這時「以弘毅自勉」，每日早起必審視外交與國情，努力擘劃建國經略，舉

¹² 《事略稿本》，1927年3月，第1冊，頁160-161。

¹³ 〈北伐宣言〉，1928年4月8日。《事略稿本》，第3冊，頁94。

¹⁴ 《事略稿本》，1929年7月，第6冊，頁236、256。

¹⁵ 《事略稿本》，1931年11月，第12冊，頁326。

¹⁶ 何偉亞著，《英國的課業》，〈導論〉，頁3-26。

¹⁷ 《事略稿本》，1931年10月，第12冊，頁158-162。

凡內政、軍事、人才、國防現代化、中俄問題、革命哲學、國際事務均加涉略，大有企圖領導「舊國」變「新國」的意味。國聯來華的李頓(Victor A. G. R. Lytton)團長甚至稱譽蔣為中國現代英雄、有本領的軍事及政治家。¹⁸蔣則心中自有忖度。

1937年，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依照蔣介石的說法，中國還屬於「一個無組織的國家」。¹⁹儘管如此，他這時已懂得國際外交爾虞我詐、縱橫捭闔之術。戰前他已看出：東亞地區在英、美、日、蘇之間，有帝國主義利害的矛盾，勢必引發國際戰爭。中國既處在衝突的焦點，宜趁機尋求獨立自主。中國要在國際變局中尋求自存，最好先觸發日蘇戰爭，但國際形勢的發展並不如預期，最後期待落空。七七事變發生後，蔣盱衡「倭暴俄狡」，²⁰決取聯俄制日之策，以便在「倭俄夾攻之中」，找尋出路，故而有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蘇俄雖未及早參戰，但戰爭初期，確實給了中國不少物質援助。對中國來說，「抗戰到底」的目的在等待國際情勢的變化，尤其盼望美日開戰，令國際力量介入中日衝突，使日本成為「國際公敵」。是而忍辱負重、以拖待援、持久消耗戰，遂成為中國爭取最後勝利的主要選擇。1939年，歐洲大戰爆發後，英美重歐輕亞的態度明顯，英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固以英國勢力不足拮抗德國為詞，爭取美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首肯美援，蔣介石亦以能單獨拖住百萬日軍的實力相要挾。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美日曾積極進行妥協性磋商，希望減低美日衝突的可能性。蔣介石對此持堅決反對與最大關注的態度，主因是有違他對美日開戰的期盼，更深恐其結果落實「帝國主義者損人利己」傷害中國的權益。²¹日本奇襲珍珠港成功之後，蔣認為他對美國妥協的

¹⁸ 《事略稿本》，1932年3月，第13冊，頁514。

¹⁹ 蔣介石語。七七事變後，蔣充分瞭解以中國一個「無組織之國家」，面對日本「有組織之國家」，更要以「一人之力」，面對「全國之力」，憂憂乎其難。見《蔣介石日記》，〈本月反省錄〉，1937年8月7日。

²⁰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30日。這一時期蔣的外交手腕，參見呂芳上，〈「最後關頭已到」：一九三七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部，2006)，頁141-182。

²¹ 蔣謂：「接閱美國所擬對倭放鬆妥協之條件，痛憤之至，何美國愚懦至此。從此可知帝國資本主義者，唯有損人利己，毫無信義可言。昔以為美國當不至此，故對美

反對，使美國對日本提出強硬的原則，遂觸發日本的挑釁，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傷，「殊覺歉惶」。但，接著，他又指出英美對太平洋作戰計畫，竟無視中國的存在，只圖利用中國消耗日本實力的輕蔑行為，中國實「無足為歉！」「國際間本是利害為主，絕無為人犧牲之國，若以此為怪或為愧，則癡矣！」²²同樣的，蔣深知當中國這般「弱國」被捧為「強權」，不必自恃為強，用俗話說，高興一天就夠。換言之，蔣保有自知之明。²³

1942年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慷慨授予中國「四強」的名號，同時邀請蔣介石出任中泰越「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羅斯福是兼具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將中國留在抗日戰場上，以求歐戰先行解決，這也許出於美國作戰策略；惟認定殖民帝國的時代已近尾聲，故對中國以「大國」來看待，應是出於誠意。²⁴不過，英國邱吉爾可不這麼想，他聲言自己無意擔任清算大英帝國的首相，恢復戰前的帝國狀態，更是他的使命。²⁵基本上，他不把中國放在眼裏，這也是後來中美英對印度問題爭執根本所在。中國作為「四強」之一，蔣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他心中自始便夾雜在「榮寵」與被「藐視」交織的矛盾。²⁶

始終信仰其非英可比，今而後知世界道德之墮廢。求己之外，再無可信之所謂與國友邦也。然而本來如此，乃竟自癡，信人太過，何怪他人！」《蔣介石日記》，1941年11月26日。

²² 《蔣介石日記》，1941年11月11日。

²³ 1942年1月2日，當蔣介石令駐美大使胡適簽四國共同宣言，並答應羅斯福之請出任中泰越戰區統帥職時，在日記中引述《聖經》上的一段話：「不必多為明日憂慮，一天難處只有一天當就足夠了；不要為明日自誇，當不要生何事，尚難自知也。」這段話出自《聖經》「馬太福音」6章34節及「箴言」27章1節。

²⁴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chapter 10.

²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5分冊，頁25。

²⁶ 看當時蔣《日記》的數則記載：

「我國簽字於四國共同宣言，羅斯福對子文特別表示稱『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1942年1月3日）

「反侵略陣線各國簽定共同宣言，我國始列為世界四強之一，甚恐名不符實，故更戒懼不勝也。」（1942年1月3日，〈上星期反省〉）

「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名義上且以美英俄華四國為中心，於是我國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統帥之後，且越南、暹羅亦列入本戰區內，於是國家與個人之聲譽與地位，實有史以來空前唯一優勝之局也。甚恐有名無實，盜虛

固然「四強」及反軸心同盟國陣線的形成，迅速帶來美國五億美金貸款和英國五千萬英鎊借款的承諾，稍有助紓解中國物資短缺的窘境。惟鑒於英美重歐輕亞，以大西洋為主，以太平洋為從的策略，東亞戰局難有轉圜的夢魘遂為之長存。作為亞洲民族解放的帶頭羊，打開沈悶局面，便成為蔣介石的負擔了。

三、蔣介石出訪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1942年2月5日至21日，蔣介石、宋美齡偕同隨員十五人正式訪問印度。這應是蔣氏夫婦作為國家領導人及第一夫人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彩排，意義非凡。²⁷這次訪問是在中國躋身四強之一，蔣氏甫就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職的一個月之際。當時隔著印度洋、喜馬拉雅山脈的印度，尚無絲毫戰火的硝煙，反倒是蔣介石帶來了戰爭腳步逼近的訊息。日本於珍珠港事變後，以大亞洲主義作號召，加快侵略的腳步，在東亞更是勢如破竹，對英、美、荷軍有若摧枯拉朽，不旋踵即橫掃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再攻略了新加坡及太平洋上的各戰略島嶼。日本勢力向東伸展到太平洋，向南抵澳大利亞沿岸，向西直逼印度洋，東南亞也已成爲戰爭的前哨。這時同盟國的戰場，唯一傳來的勝利是長沙會戰的捷報(1942年1月5日)。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世界反軸心的戰線已連成一氣。中國戰略地位既已提升，國際地位乃隨之水

名而受實禍，能不戒慎乎哉。」(1942年1月31日，〈本月反省〉)

²⁷ 蔣介石訪印，1942年2月9日的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出版專輯，題為「中印心連心：兩大戰友同盟的一個歷史轉折點」(“India Heart One With China: Comradeship in Arms of Two Countries –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轉見吳俊才，〈蔣中正先生訪印與印度獨立〉，《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1985)第4冊，頁192-211。當時隨行的重要人員包括中央宣傳部長董顯光、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張道藩、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商震、侍從參謀皮宗敢、侍從秘書俞國華、中央社副社長王家楫、以及英駐華即將卸任的大使卡爾(Sir Archibald Clark Kerr)等人。近年學界對蔣1942年訪印較新的研究成果：Qiang Zhai, “A Passage to India: A Reappraisal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plomacy,” 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2011)，頁279-306。

漲船高。蔣介石獲得亞洲最高尊崇，正為他涉足世界外交事務提供了契機。在另一方面，珍珠港事變後，東亞局勢有了變化。印度在世界反侵略戰爭中，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它不僅是英國賴以同德、義、日抗衡，挽回南太平洋頹勢的首要大後方和戰略根據地，也是萬一緬甸失守後通向中國的唯一國際通道。然而，當時英、印關係十分緊張，以甘地為精神領袖的國大黨表示，如果印度不能獲得完全獨立，印度就不參加此次戰爭。²⁸為了發揮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確保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不為日敵顛覆利用，也為了保護已受威脅的唯一國際交通孔道——滇緬公路，及籌畫開關的新交通線——中印公路，蔣介石決定挾長沙大捷之威出訪印度。²⁹1月30日，蔣自己說訪印的目的有五：(一)勸英印互諒互讓。(二)勸印多出兵出力。(三)勸英允許印度自治。(四)為將來中印合作之基礎。(五)宣揚三民主義。³⁰更具體的說，包括了中印公路交涉、中印航空聯繫、運輸通信交涉、考察印度西北邊防、與甘地等領袖會晤、調解英印關係、勸告英政府允許印度自治、勸告印度接受自治領權益、調解印度各黨派等項。³¹顯然任務艱鉅，達成匪易。英國對蔣訪印之行，反應冷淡，固不願他人插手其內部事務，只因考慮盟國關係與對日戰爭，勉為同意。³²

蔣介石一行，1942年2月5日到加爾各答，8日到達新德里，21日返國，在印共盤桓16天。

蔣介石抵印度加爾各答，到達之初，官方接待稍見怠慢，訪問過程對

²⁸ 吳俊才，《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香港：中印學會，1950)，頁181-182。

²⁹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日記：「一、托羅斯福總統轉達邱吉爾對確保印度與大戰期中，如何使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貢獻其人力物力，而不為敵國所煽惑，甚至於發生叛亂也；二、否則各殖民地必被敵國利用倒戈。此比軍事計畫更應注重也。」

³⁰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30日。

³¹ 《蔣介石日記》，〈上週反省錄〉，1942年2月7日。

³² 隨行訪印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日後說，蔣介石訪印，最初是由英駐華大使卡爾發動的(見羅久芳、羅久蓉編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日記〉，1952年5月25日。)此說存疑。根據蔣訪印前的日記(1942年2月2日)記述，蔣對卡爾大使任內的成績並不滿意，且在錢別宴上互相挖苦。蔣謂：「余一心達成訪印目的，確受其公開欺凌亦不以為意，置若不聞不解者，彼或不願余訪印不得面卻，乃以此激余之怒乎？」另在《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231，亦有相似記載。

繁文縟節表示厭煩。³³不過，整個過程順利，受到印度朝野各界熱烈歡迎。印度總督林里資哥(Lord Linlithgow)為他舉行盛大宴會、檢閱軍隊，英軍將領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亦舉行政治軍事會談，又安排了槍廠、鋼廠、開伯爾山要塞等參訪活動。蔣復與印度各界人士、民族運動領袖接觸，會晤了名人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甘地(Mohandas K. Gandhi)、國大黨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ri Kalam Azad)、穆斯林聯盟主席真納(M. A. Jinnah)、女界領袖潘迪特夫人(Vijay Laxmi Pandit)等。與甘地會面時，蔣表示同情印度的民族訴求，更希望在反軸心戰爭中發揮更大作用。甘地則介紹印度非暴力鬥爭策略，表達雙方合作的願望。尼赫魯與蔣見面 3 次，還陪同參觀國際大學，並表示印度因英國不能解除其枷鎖，故未能全力參戰，但也不規避對付侵略者的責任。蔣此行目的之一是打開英印衝突和緊張僵局，在臨回國前還不顧英首相邱吉爾希望他不要有「違反總督，或英王意願的舉動」的勸告，³⁴堅持發表了英人聽來不悅的〈告印度國民書〉。蔣介石此行，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在表述了一個有被殖民經驗的革命領導人，如何找尋帝國主義與民族自決矛盾的解決之道。

四、重構亞洲政治經驗

1942 年蔣介石訪問印度時的心情有些複雜。他所帶領的是論力則虛、論文化歷史則悠久厚實的「大國」。他出發前對印度的思考，雖國情有異，背景、處境卻有相似的感受；被殖民經驗雖不盡相同，但要求主權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目標，又相當接近。他在訪問行程出發前說：「中印兩國歷

³³ 1942年2月4日，蔣飛抵臘戍機場，英人未能如約準備住處，只好在行政公署投宿，隨行人員均未得食宿。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4日。2月10日晚，在新德里應印度總督之宴，儀式繁瑣，蔣深覺不耐，認係封建與帝制時代的遺物、英致敗之因：「余猶幸到印度，當見英國之儀式，無異十六歲入科舉場內得見此怪狀與風味耳。」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11日、20日。隨行的侍從秘書俞國華，在回憶中述及另一入境問俗的趣事：尼赫魯見蔣行翻筋斗之歡迎禮，中政學校教育長張道藩受命翻筋斗答禮。見俞國華口述、王駿執筆，《財經巨擘：俞國華生平腳》（臺北，商智文化，1999），頁174。整個訪印行程另可參考秦孝儀主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1978）第5卷上冊，頁17-21。

³⁴ *New York Times*, 22 February 1942.

史之關係已二千年，邊疆接壤界線甚長，民族亦為世界上之最大者。然而從未發生衝突或武力戰爭之時，亦有文化之溝通、禮義之往來，豈非全世界和平民族之最著者乎。吾願珍重此兩國之歷史而發揚光大之。」³⁵這一段文字的意思，在2月21日離印〈告印度國民書〉中，再度獲得表達，³⁶顯現亞洲民族在歷史文化上，確有相憐相惜之處。

歷史的情懷畢竟敵不過政治的現實。蔣介石的心目中，當下的問題是要防止東亞民族為日敵所用，以免壞了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局。長遠來看，中國的完全獨立與印度民族解放同等重要。他試著要推動的是自孫中山以來民族主義的精髓：求世界各民族的自由解放。蔣說他訪印乃「為戰後對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³⁷言下之意是老牌帝國主義應該退場。他希望羅斯福將來的事業，宜特重遠東，以輔助中國獨立與印度民族之解放。³⁸蔣的確很想在戰時即先經營此一氣氛，但在帝國主義架構未能拆除前，中英關係下的中印關係，或英印關係下的中印關係，卻不是他隨意能改變和展開的。

儘管1942年中國已躍升為世界大國之一，但中英、中美的實質關係未進反退。自二〇年代以來，蔣介石對英帝國主義本有歷史情結，已如前述。四〇年代初，在歐洲優先、亞洲其次的政策下，羅斯福是「金主」，偏重邱吉爾，蔣介石不能不吃味。邱吉爾本人復在言語上常有蔑視和冒犯中國之嫌。³⁹加上英緬當局一再扣留美國援華物資，中英關係始終處於低潮。⁴⁰在

³⁵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1日。

³⁶ 蔣介石，〈告印度國民書〉，1942年2月2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第31卷，頁289-292。在訪印過程中，蔣有幾個值得深思的「歷史情懷」：「飛機中看我國與越緬暹羅史，越緬被侵皆我生之前二年，而暹羅叛華則在光緒19年，為我六歲時也，能不有所感乎？」（2月5日）；「上午……見尼泊爾王子並代貢其父虎皮一張及羅比五萬元為求救護祖國戰時難胞之用，余誠心接受。且生歷史無窮之感。」（2月12日）；「到伽姆羅達，受阿富汗提等族歡迎會，到酋長百多人，多為不丹、錫金人，三十年前皆為我國人，不禁稱之為同胞。」（2月13日）此中似乎隱含著一位走向近代民族主義者，卻具有傳統文化民族主義的歷史感受。

³⁷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3日。

³⁸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5日。

³⁹ 有關大西洋憲章的適用問題，參見《顧維鈞回憶錄》，第5卷，頁70；直到1944年8月，邱吉爾都還說這樣的話：「把中國當作世界四強之一，完全是個笑話。我曾經

這樣的情勢下，蔣介石訪印想解開英印關係的死結，自非易事。其中涉及的是「帝國主義」架構下國與國、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

邱吉爾說，他當英國首相的目的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解體，這句話很寫實的說明戰時英印關係不易變動。蔣介石還沒啟程赴印，英國即已表明對印度這塊殖民地的態度，蔣說：「英政府歡迎我訪印，要求我離印時勸告印人全面合作之宣言，只言倭寇之罪惡與兇暴之實情，而少言英印關係為宜。」⁴¹這裏的「英印關係」，指的是大英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中國(蔣介石)想碰撞這個帝國主義的「禁忌」，顯然不是邱吉爾所樂見。蔣在這方面手腕倒是具彈性，既不願意與老牌的帝國主義者翻臉，但也不能不說出作為民族的國際主義者的態度。1942年2月21日，當蔣訪印結束發表〈告印度國民書〉時，一方面符合英政府的期盼，寄語印人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攜手合作，對付暴日；另一方面，不忘記呼籲英國「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之實權。」⁴²據蔣介石自述，其中涉及帝國政府對殖民地態度的用語，煞費苦心：「英政府立時與早日賦予印度人民之實權一語，對於『立時』與『早日』兩詞，極費斟酌，最後決定用『從速』字樣。」同時又說：「余發此告別書，完全協助印度之解放，英國政府或不甚諒解，但余深信於英實有益也，故不計一切利害亦論甘地先生對余態度，……余一本余對印度一貫之政策，表示余對印度之政見，而且為此次來印最大任務與目的也。」⁴³蔣介石訪印之行，本在促成印度加入反軸心陣線，也思考印度成為援華軍火中繼站的可能。因情勢複雜，的確碰觸到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關係的敏感神經。蔣介石似乎清楚的抱定近代民族自決的原則，並以作為一個亞洲領袖的身份，強力介入東亞民族主義覺醒與傳統帝國主義不願鬆手的對峙漩

對總統(羅斯福)說過，美國既對這一點堅持，我當對這事表示適度的尊重，但是我不同意我們對於這件事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邱吉爾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2001)第4卷，頁1016。

⁴⁰ 1942年1月1日《日記》中說，為此「憤激無已，英人之狡獪，不可以言喻。」隨即向英提出極嚴重的抗議。後來香港問題的交涉也成棘手事項。戰時中英同盟固然不可能，蔣夫人不願訪英，也顯示兩國外交的困局。

⁴¹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9日。

⁴²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1卷，頁291。

⁴³ 《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21日。

渦中。

從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中國的政治局面與世界政治思潮都在轉變。北伐成功，使中國表面上獲得統一，蔣介石身為國家領導人，有自覺的承擔了國家領袖的角色，並推動近代國家的建立。他先遭遇的「西方在中國」的困境，於是朝國家實體平等的方向努力，修約、廢約、締約爭取自主，重定國家領土疆界，以求加入到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就是一例。當國內的困難逐步解除，三〇年代日本勢力入侵時，蔣介石已儼然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強人。四〇年代，因近代國家的建立，各國似乎也形成領袖與國家重疊的現象，美國羅斯福、英國邱吉爾、蘇聯史達林、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中國蔣介石，甚至印度甘地等，均於此時乘勢鵲起。在國族主義擴張與戰爭影響下，他們甚至都有走向全能主義傾向。他們對內對外的活動，不只左右國家政治，還影響國際格局。⁴⁴四〇年代的中國雖為四強中的一員，但蔣介石的確對西方事務插不上手。他對南亞的印度有興趣，正好是可以扮演國際角色的另一個好選擇。1942 年，蔣介石出訪印度是「中國走向世界」重要的一步，訪問過程更表現了世界思潮與區域政治的糾纏。

1942 年 2 月 18 日，蔣介石好不容易見到了雖屬初見，卻又像「一位多年老同志」的甘地。⁴⁵先此，蔣已見過長期追隨甘地的國民大會(國大黨)的領袖尼赫魯、國大黨主席阿柴德。他們的共同語言是世界思潮中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蔣、甘、尼、阿都看到白色人種對有色人種的迫害事實，對異族統治的經驗也刻骨銘心。甘地在南非時期(1893-1914)見證了白人對黑人像兔子般被宰殺場景、1920 年後英統治者在印度的暴行，復證明「英美的民主主義是假面具，他們只為了白種人的利益。」對被壓迫民族來說，

⁴⁴ 從杜贊奇與Rebecca的分析得到啟發，見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⁴⁵ 從英相邱吉爾到印督林里資哥都不希望蔣介石與甘地會面。英方運用階級、體面、地點、禮儀種種問題進行阻撓，但蔣堅持之下，2月18日在加爾各答甘地友人比拉(Bila)家中見了面。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10-15日。又見2月11日、13日，甘地、尼赫魯致蔣委員長函；2月15日英使卡爾與委員長談話紀錄，均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81)，頁374-395。(以下簡稱《戰時外交(三)》)

外族統治者均屬惡劣，仍在英統治下的印度，「只有獲得自由，方能解脫英國的屠刀或其他外族的屠刀。」⁴⁶蔣介石說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想聯結世界被壓迫的各民族，推翻殘暴的帝國主義，指出英國人百年來對中國的殘害絕不亞於印度。至今中國也仍受英帝國的桎梏，而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他進一步說現在日本人的殘暴更甚於英人。⁴⁷蔣、甘的對話有各自地域政治的特殊性，這也影響了他們對反殖民、爭自主方法的差異。1940年代二次大戰時期，印度仍為英國高壓下的殖民地，甘地採取非暴力的「不合作主義」，針對的是英國，這是長期以來印度人民對這一老大帝國不信任的結果。與甘地接近的國大黨認為英印政府是異國人的政府，印人對英政府絕難合作，除非他們先獲得實質主權。在以反殖民政府為前提的思考邏輯下，對反侵略、反軸心的戰爭，印人也就不會熱中了。中國雖也受帝國主義迫害，有被瓜分的勢力範圍，但沒有外國人設立政府宰制全中國的事實，被殖民經驗不同，反帝國主義的想法也異。只有中印兩國同獲解放自由，然後全世界才能自由和平，這是中印領袖人物的共識。當面對軸心國挑戰時，反殖民與反侵略孰先孰後，便有了爭執。蔣介石說他不認為甘地「不合作主義」可用於印度以外的地區，蔣說他不會干涉英國內政，對印度沒有野心，但他認定英帝國已腐化，英印政府不打也會垮台。但要獲得民族自由，時機重要，現在參戰，獲得戰後和會代表權，會更有保障。這也是他對尼赫魯說的，用間接(政治)的方法達成印度問題的解決才是上策。具體的說，即先取得自治領的地位。⁴⁸此事又涉及英國「一切待戰後解決」的態度。當時

⁴⁶ 〈蔣委員長會晤甘地談話紀錄(1942年2月18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418。甘地在南非及印度的反殖民地運動，中文資料可參考薛留生，〈甘地的一生〉，《東方雜誌》，第44卷第5號(1948.05)，頁1-13；糜文開，〈甘地簡要年譜〉，《東方雜誌》，第44卷第5號(1948.05)，頁26-30。

⁴⁷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418-419；蔣介石與阿柴德、尼赫魯談話紀錄，1942年2月21日，同上書，頁360-361。

⁴⁸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360-377。1942年2月17日，蔣介石對尼赫魯談革命經驗，認為印度革命條件優點：(一)已得全世界知識分子同情，(二)印度之英印政府已自腐必自倒；弱點：(一)交通太發達不易革命，(二)無法練兵，缺武力，(三)人民知識不足，乏人才。因此

英政府連「從速賦予印度實權」都做不到，那就更別說間接辦法了。因此印人自覺一切無法自主，對中國抗戰只能無奈地出諸「同情」而已。此行，蔣介石的確沒有打動甘地的想法，甘地說：「我們心中絕無餘地可以容納英國的帝國主義，但是我們接受閣下的忠告，不作節外生枝增添災害的舉動，讓惡魔去自生自滅。」⁴⁹蔣本想轉移甘地對英態度，以共同對日作戰，結果落空，蔣對甘地的「忍心」，不免失望。⁵⁰

1940年代，中國因抗戰而使國家地位和形象有所改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漸行撤除，於是走向世界，拓展國際關係，以扮演亞洲反侵略陣線領導者的角色，有了空間；印度則仍面臨英帝國主義勢力籠罩，外族統治者仍是民族主義的主要敵人。殖民地作戰，多因民族鬥爭而減弱，這正是蔣介石所想到的：「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問題。⁵¹也是此行難有具體收穫的癥結所在。

五、結論

1942年蔣介石訪印，是戰時外交的一環，中日戰爭國際化後，蔣思考的是國際政治框架下，如何不使殖民地為日敵所用，是他「外交是無形的戰爭」⁵²的具體實踐。這又顯示中國開始涉入其他國家事務，是中國從「世界進入中國」走到「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標識。蔣介石是在中國被推崇

應發展國內教育，爭取國際同情。但這些方法只能對付英人，難對付日本。見〈蔣介石與尼赫魯談話紀錄(1942年2月1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405-406。

⁴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423。

⁵⁰ 蔣在會見甘地次日的《日記》上說：「昨會甘後，對其態度不覺失望，此或余熱心過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統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鐵石心腸，無論任何革命熱忱亦不能轉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對其觀念之綜論，彼惟知愛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類也，可謂忍心極矣。」《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19日。

⁵¹ 〈蔣介石與印度總督林里資哥談話紀錄(1942年2月10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356-357。

⁵² 蔣介石講，〈外交為無形之戰爭(1931年11月30日)〉，收入中央宣傳部編，《蔣委員長言論類編》(重慶，正中書局，1938)，頁74。轉見家近亮子，〈蔣介石與日美開戰〉，2009年5月7日，臺北中研院演講稿。

為四強之一，自己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訪印，他知道中國的條件，故有自知之明，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⁵³但他善於利用機會，進行外交出擊。他把此行界定為濟弱扶傾之旅，時時惦記的是解放亞洲被壓迫的民族，也把中國包括進去，突顯了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的一面。⁵⁴有意思的是他接受帝國主義者(英、美)的安排，晉身四強之階，卻又常批判帝國主義的是與非，時時提醒自己不要稱霸。⁵⁵

平心而言，蔣介石此次訪印之行，不論過程與結果皆不如理想。但作為一個具有彈性的國際主義者的外交手腕，卻又顯得十分靈活。他的確插手大英帝國內政，但他口口聲聲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明明與印度攜手對付英帝，但措辭謹慎的要求英國對殖民地印度儘速放手。⁵⁶印度內部包含政治、民族、宗教、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他應付各方大體能夠持平，但重心還是擺在國民大會(國大黨)與穆斯林人士身上。他聯合印度勢力以對付軸心國的遊說沒有成功，但至少得到印度各方人士對反侵略陣線「不搗亂」的消極承諾。⁵⁷蔣介石是民族主義者，他響應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號召，他要求

⁵³ 蔣介石，〈最近一年來外交財政經濟軍事報告(1942年10月2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9卷，頁347-348。

⁵⁴ 除蔣介石訪印人會談的陳述外，他日記中也不時提出對亞洲各民族解放任務的想法，例如1942年6月22日《日記》：「中國抗戰乃為亞洲民族鬥爭與民主集團聯鎖之樞紐。」9月15日：「吾人應以印度自由與亞洲各民族平等、協和，為對英美外交方針之基礎也。」11月23日對顧維鈞談外交：「余屬其毋背我外交根本方針，以解放亞洲被壓迫民族，尤以不使印度民眾失望為誠也。」

⁵⁵ 蔣常視英人為「自私自利者」、「狡獪之流」(1942年5月16日《日記》)，對美國也提防，1942年5月，與史迪威相處不悅，引發他對友邦的懷疑，「今而後知所謂同盟與互助皆為虛妄之言，美國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中國尚有一片土地與相當兵力以圖自存，而未為帝國主義者完全犧牲耳。」《蔣介石日記》，〈本月反省〉，1942年5月31日。

⁵⁶ 邱吉爾回憶錄中明白指責蔣干預英國內政：「由於日本的威脅，國大黨的態度變得更壞了。1942年2月，蔣介石大元帥夫婦訪問印度，當時，這種情況顯現得甚為清楚。他們訪問的目的，在於喚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緒，並且強調打敗日本，對亞洲全部，特別是對中國與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黨領袖利用機會，通過大元帥向英國施加壓力，希圖英國屈從於國大黨的要求。戰時內閣不能同意，一個外國元首竟在英國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與尼赫魯先生之間，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進行干預。」邱吉爾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2001)，第4卷，頁151。

⁵⁷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

中國自身的解放，他同情印度殖民地的現狀，但希望印度民族自主要一步一步慢慢來，以「參戰」求得國際同情，戰時不妨先成為英國自治領再謀獨立；建立新國家要有好幹部，故培養人才不妨先由教育入手。這些對印度民族主義者而言，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不切實際，故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在國際反侵略合作的實務上，實在不算成功，對協調英印關係，更未見絲毫助益。不過，蔣自認此行並不失敗，1942年年底，他的總檢討說：「外交成就，今年為最大，然受辱與被侮亦以今年為最甚；印度之行，雖多遺憾，然而經歷與進益實為不少。」⁵⁸訪印之行的確使中國國際的能見度提高，也累積了蔣介石個人的聲望。

近代的亞洲經驗如果把它看成是亞洲人自己處理亞洲事務，那蔣的訪印之旅是一初步的嘗試。歐戰後民族自決已成為世界歷史重要遺產，但當它在各地流行時，便產生了不同的地域效應。1920年代後，中國人高呼民族自決，參雜威爾遜的理念，也有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傳承，蔣繼承並落實為外交政策便是維護領土完整、企求主權獨立，故而廢除不平等條約、扶植弱小民族，成為具體工作。1940年代初期，中國自身對外締訂平等新約工作正逐步實現，求亞洲民族解放也要付諸實行。亞洲地區「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因戰爭帶來發展契機，⁵⁹中國這時與印度攜手對付帝國主義，除了文化上的聯繫，也有了世界共同思潮作背景。但由於地域不同，條件各異，民族主義內容與表達也不會一致。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有印度的哲學與傳統，蔣介石無法以現代的民族主義方法加以說服，因為蔣介石用中國經驗，提供對付帝國主義的方法，不為印人認同，毋寧是自然不過的事。蔣介石也自覺他可能被視為亞洲領導人之一，但不定能把中國經驗放諸四海而皆準，所以他一直不願使用「領導亞洲」這樣的字眼。⁶⁰不過，日本不然，戰時「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經過日本人的詮釋，

頁422-423。

⁵⁸ 《蔣介石日記》，〈三十一年總反省〉，1942年12月31日。

⁵⁹ 從英國的角度思考二戰後英「去殖民地化」的討論，參見W. David McIntyre, *British Decolonization, 1946-1997*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⁶⁰ 蔣介石，〈最近一年來外交財政經濟軍事報告(1942年10月2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9卷，頁347。

變成：亞洲是日本人的亞洲，欲求取白人而代之。⁶¹這也正是蔣介石訪問印度的另一個意義：如何轉移印人親日反英，如何防止民族自由變成民族優越，⁶²如何清除以變相的「新帝國主義」取代原有的「舊帝國主義」。⁶³

1949年，蔣介石在中國遭到嚴重挫敗，西方帝國主義者對他撒手不管，印度總理尼赫魯對英國亦步亦趨，蔣很有「被背叛」的感覺。1950年1月，蔣在臺灣大溪寫下類似遺囑的文字，指斥英「企圖滅絕我東方民族自由之靈魂」，又數說美國縱容俄共併吞中華民國野心的不是，進一步表明自己將「為東方民族之解放與中華民國革命而生，亦應為東方民族之解放與中華民國革命而死」的決心。⁶⁴一個彈性國際主義者遭遇困境時，又不免再回到民族主義中求出路，但，這個民族主義似乎不全侷限於中國。

⁶¹ 〈蔣介石與赫白脫談話記錄(1942年2月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頁331-333。當時輿論界對這方面的顧慮最多，參見〈由蔣委員長印度之行瞻望今後的亞洲政局〉，《大公報》(重慶)，1942年2月14；〈蔣委員長對印度之發言〉，《大公報》(重慶)，1942年2月24日。

⁶² 蔣對法西斯納粹黨的形成有顧慮：「此次戰爭乃爭民族自由而非爭民族之優越，如為爭民族優越而戰，則勝利者將為『納銳』之績，不僅於世界人類無益，而實有損害，此決非我民主集團之宗旨也。」《蔣介石日記》，1942年10月2日。

⁶³ 1942年11月17日，蔣在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專文中有一段話，可以參考中國不作亞洲領導者，「中國並不期望以東方式的帝國主義，或任何種類的閉關主義代替西方式的帝國主義。……我輩以為世界在新的自由國家間，平等互賴的世界，非東方式的閉關主義，亦非歐美式的閉關主義，而係全世界整個的合作，乃得消弭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而代之。」秦孝儀主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1978)第5卷上冊，頁236-237。

⁶⁴ 《蔣介石日記》，〈大事記〉，1950年1月。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史料彙編

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27年1月-8月)》，第1冊，臺北：國史館，2003。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27.01-08), di 1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3.
2.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28年4月-7月)》，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3。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28.04-07), di 3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3.
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29年6月-10月)》，第6冊，臺北：國史館，2003。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29.06-10), di 6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3.
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1年9月-12月)》，第12冊，臺北：國史館，2004。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31.09-12), di 12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2年1月-4月)》，第13冊，臺北：國史館，2004。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32.01-04), di 13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2年6月-7月)》，第15冊，臺北：國史館，2004。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32.06-07), di 15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2年8月-9月)》，第16冊，臺北：國史館，2004。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1932.08-09), di 16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
Zhongguo di er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Jiang Jieshi nian pu chu gao*, Beijing : Dang an chu ban she, 1992.
9.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

Qin, Xiaoyi, zhu bian. *Zhonghua Minguo zhong yao shi liao chu bian: dui Ri kang zhan shi qi*, Di 3 bian, Zhan shi wai jiao 3, Taipei: Zhong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1.

10.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Qin, Xiaoyi, zhu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Taipei: Zhong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11.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1978。

Qin, Xiaoyi, zhu zuan. *Zong tong Jiang gong da shi chang bian chu gao*, Tapei, 1978.

(二) 日記、文集、回憶錄、口述歷史

1.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雜錄〉，1920年，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Za lu," 1920 nian, ying yin yuan jian.
2.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25年6月，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1925 nian 6 yue, ying yin yuan jian.
3.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28年5月；9月，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1928 nian 5 yue; 9 yue, ying yin yuan jian.
4.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本月反省錄〉，1937年8月7日，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Ben yue fan sheng lu," 1937 nian 8 yue 7 ri, ying yin yuan jian.
5.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1937 nian 9 yue, ying yin yuan jian.
6.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41年11月；12月，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1941 nian 11 yue; 12 yue, ying yin yuan jian.
7.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月；5月；6月；9月；10月；11月；12月，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1942 nian 1 yue; 2 yue; 5 yue; 6 yue; 9 yue; 10 yue; 11 yue; 12 yue, ying yin yuan jian.
8. 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50年1月，影印原件。
Hufo yan jiu suo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1950 nian 1 yue, ying yin yuan jian.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yi. *Gu Weijun hui yi lu*,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1987.

10. 邱吉爾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2001。
Qiu, Jier, zhu, Wu Wanshen, deng yi. *Di er ci shi jie da zhan hui yi lu*, Taipei: Zuo an wen hua, 2001.
11. 俞國華口述、王駿執筆，《財經巨擘：俞國華生平行腳》，臺北：商智文化，1999。
Yu, Guohua, kou shu, Wang Jun, zhi bi. *Cai jing ju bo: Yu Guohua sheng ping xing jiao*, Taipei: Shang zhi wen hua, 1999.
12. 羅久芳、羅久蓉編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日記〉，1952年5月25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Luo, Jiufang, Luo Jiurong, bian zhu. *Luo Jialun xian sheng wen cun bu yi*, "ri ji," 1952 nian 5 yue 25 r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2009.

(三) 專書

1. 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課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Hevia, James L., zhu, Liu Tianlu, Deng Hongfeng, yi. *Ying guo de ke ye: shi jiu shi ji zhong guo de di guo zhu yi ke cheng*,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7.
2. 吳俊才，《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香港：中印學會，1950。
Wu, Juncai. *Yindu du li yu Zhong Yin guan xi*, Hong Kong: Zhong Yin xue hui, 1950.
3.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Ji, Xianlin, zhu bian. *Hu Shi quan ji*, Hefei: Anhui jiao yu chu ban she, 2003.
4. 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
Xu, Guoqi, zhu, Ma Jianbiao, yi. *Zhong guo yu da zhan: xun qiu xin de guo jia ren tong yu guo ji hua*, Shanghai: san lian shu dian, 2008.

(四) 期刊、論文、報紙

1. 〈由蔣委員長印度之行瞻望今後的亞洲政局〉，《大公報》(重慶)，1942年2月14日。

- “You Jiang wei yuan zhang Yindu zhi xing zhan wang jin hou de ya zhou zheng ju,” *Da gong bao* (Chongqing), 1942.02.14.
2. 〈蔣委員長對印度之發言〉，《大公報》(重慶)，1942年2月24日。
“Jiang wei yuan zhang dui Yindu zhi fa yan,” *Da gong bao* (Chongqing), 1942.02.24.
 3. 呂芳上，〈「最後關頭已到」：一九三七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部，2006。
Lu, Fang-shang. “‘Zui hou guan tou yi dao’: 1937 nian Jiang Zhongzheng ri ji de kao cha,” shou ru *Rong yao de shi pian: ji nian kang zhan sheng li liu shi zhou nian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 Taipei: guo fang bu, 2006.
 4. 蔣介石，〈告印度國民書(1942年2月2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Jieshi. “Gao Yindu guo min shu(1942.02.21),” shou ru Qin Xiaoyi, zhu b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5. 蔣介石，〈最近一年來外交財政經濟軍事報告(1942年10月2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Jieshi. “Zui jin i nian lai wai jiao cai zheng jing ji jun shi bao gao(1942.10.29),” shou ru Qin Xiaoyi, zhu b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6. 蔣介石訪印，1942年2月9日的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出版專輯，題為「中印心連心：兩大戰友同盟的一個歷史轉折點」(“India Heart One With China: Comradeship in Arms of Two Countries –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轉見吳俊才，〈蔣中正先生訪印與印度獨立〉，收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4冊，臺北，1986。
“India Heart One With China: Comradeship in Arms of Two Countries –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zhuan jian Wu Juncai, Jiang Zhongzheng xian sheng fang Yin yu Yindu du li, shou ru, *Jiang Zhongzheng xian sheng yu xian dai zhong guo xue shu tao lun ji*, di 4 ce, Taipei, 1986.
 7. 蔣介石講，〈外交為無形之戰爭(1931年11月30日)〉，收入中央宣傳部編，《蔣委員長言論類編》，重慶：正中書局，1938。轉見家近亮子，〈蔣介石與日美開戰〉，臺北：中研院演講稿，2009年5月7日。
Jiang Jieshi, jiang. “Wai jiao wei wu xing zhi zhan zheng(1931.11.30),” shou ru zhong yang xuan chuan bu, bian, *Jiang wei yuan zhang yan lun lei bian*,

- Chongqing: zheng zhong shu ju, 1938. Zhuan jian Jiajin Liangzi, “Jiang Jie shi yu ri mei kai zhan”, Taipei: zhong yan yuan yan jiang gao, 2009.05.07.
8. 糜文開，〈甘地簡要年譜〉，《東方雜誌》，第44卷第5號(1948.05)。
Mi, Wenkai. “Gandi jian yao nian pu,” *Dong fang za zhi*, di 44 juan di 5 hao (1948.05).
 9. 薛留生，〈甘地的一生〉，《東方雜誌》，第44卷第5號(1948.05)。
Xue, Liusheng. “Gandi de yi sheng,” *Dong fang za zhi*, di 44 juan di 5 hao (1948.05).

(五)英文資料

1.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2.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 Century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David, McIntyre W. *British Decolonization, 1946-1997*,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5. *New York Times*, 22 February 1942.
6.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7. Qiang, Zhai. “A Passage to India: A Reappraisal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plomacy,” 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
Qiang, Zhai. “A Passage to India: A Reappraisal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plomacy,” shou ru Lu Fang-shang, zhu bian, *Jiang Zhongzheng ri ji yu min guo shi yan jiu*, Taipei: shi jie da tong chu ban she, 2011.
8. Guoqi, Zu.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2005.

Chiang Kai-shek, a Flexible Internationalist: On His 1942 Visit to India

Lu, Fang-shang

Head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In the wake of the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at the end of 1941, China eventually rose to be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Big Four" as the Allied frontline formed. As the leader of a colossal Eastern nation, Chiang Kai-shek took pride in casting off the "unequal treaty system" set up in China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while humbled by the fact that a "China like the middle ages" stood equal to the modernized major powers. Through his records, on China as a fragile nation confronting international powers, Chiang's diary explicitly indicates his awareness of the disparity in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insic tribulations that it caused.

In February 1942, Chiang Kai-shek and his wife Soong May-ling, accompanied by fifteen members of entourage, embarked on a formal visit to India. The trip itself was not entirely successful in retrospect, but showed that Chiang was shrewd and resourceful when dealing with diplomatic affairs. Chiang, mindful of liberating the suppressed nations in Asia, China included, defined the goal of this trip as "to relieve the less privileged and support those on the brink". Antagonism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was pivotal. It is intriguing to see how Chiang reconciled imperialist agenda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tep for China to become one of the Big Four, constantly criticizing imperialist fallacies and consciously eschewing hegemony.

In view of Chiang's long-term experience and exploits since his involvement in and later dominance over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1920s, Chiang was arguably

both a nationalist and a flexible internationalist.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India, Mohandas Gandhi, flexible internationalist